

# 荀彧死因探析

宋雪瑶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119)

**摘要:**《三国志》和《后汉书》对荀彧的死因、定位及评价有所不同,引发了学界的研究兴趣。大多数学者认为,荀彧因忠汉而反对曹操加九锡、称魏公而死。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由于《三国志》是在两晋否认曹魏正统以及有意塑造先祖形象为汉臣的环境下写成,《后汉书》是在胡汉政权对立、民族矛盾尖锐、着重强调殉汉的时代背景下完成,均存在美化荀彧忠汉形象的可能。结合史料考察与荀彧关系密切之人在曹魏代汉之际的表现及其在曹魏政权建立之后的仕宦经历,可证荀彧之死不是因为忠汉,而是由于其作为颍川士人集团的核心人物遭到曹操的疑忌被迫身死。

**关键词:**荀彧; 死因; 曹操; 朋党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1-0028-05

荀彧在汉魏之际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曹操的重要谋臣,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显著功勋,其死因一直存在争议。当今学者大多认为荀彧因忠汉反对曹操称魏公而死<sup>[1]</sup>,其中一些学者从更具体的角度研究荀彧的死因,或认为荀彧具有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固有的依附性使其死亡<sup>[1]</sup>,或认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其死亡<sup>[2]</sup>,或认为是因以荀彧为代表的颍川士人集团与曹操集团在利益和文化观念方面的冲突使其死亡<sup>[3]</sup>。目前学界从荀彧背后的政治势力角度对其死因的探析尚显不足,个别学者注意到曹操对荀彧背后的颍川集团的忌惮却未做详细分析<sup>[4]</sup>。笔者试图突破学界认为荀彧因忠汉而死的藩篱,从荀彧背后的政治势力角度来探讨其真正死因,以求教于方家。

## 一、荀彧形象的曲笔

荀彧在弃袁奔曹后,积极为曹筹谋献计,使其在曹帐下迅速崛起,成为曹操称霸北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也”。荀彧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封万岁亭侯,原本官运通达的荀彧却在建安十七年死去,而史书关于荀彧之死存在不同记载。

《三国志·荀彧传》载:“(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晋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谂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

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sup>[5]317</sup>董昭等人在建安十七年劝曹操称魏公之际曾私下咨询荀彧,但荀彧认为曹操应以恢复汉室为其主要目标。曹操或许由此对其不满,因而在攻打孙权时一反常态,没让荀彧随军,而让其留在寿春养病,荀彧因忧虑去世。

《后汉书·荀彧传》对荀彧之死所载则有所不同:“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sup>[6]290</sup>此处所言荀彧是被曹操赐死的。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献帝春秋》<sup>[2]</sup>的记载又有不同:“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sup>[5]318</sup>荀彧因不愿听从曹操让其杀伏后的安排而自杀。对此,裴松之认为所载不实。《后汉书·皇后纪下》:“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假为策曰……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sup>[6]452</sup>由此知伏后死于建安十九年,因密谋杀曹之事泄露,被曹操

收稿日期:2019-09-16

作者简介:宋雪瑶,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赐死。此时荀彧已去世,故《献帝春秋》的说法并不可信。

综上可知,荀彧之死因以《三国志》“忧死”和《后汉书》“赐死”这两种记载为主。此外,《三国志》和《后汉书》对荀彧的定位和评价也有所不同。《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sup>[5]332</sup>《后汉书》作者范曄认为:“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sup>[6]2292</sup>陈寿以荀彧作为魏臣未能完成其辅佐曹操建立功业的志向感到遗憾,范曄则认为荀彧为汉臣,杀身成仁,死得其所。还有,荀缙为荀彧迎娶唐衡女儿的史料只在《后汉书》中出现,《三国志》中并未提及。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两部史书中的记载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认为:“自《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而范蔚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观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焉。虽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sup>[7]119</sup>陈寿身处西晋须有避讳,而范曄时隔已远可秉笔直书。再看裴松之评荀彧:“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sup>[5]332</sup>虽前揭范曄直笔,但为什么同处刘宋的裴松之对荀彧的定位与死亡评价与范曄如此类似呢?他们都认为荀彧是汉臣且死得其所,但西晋的陈寿却认为荀彧是魏臣且抱负未成,同时赵翼指出陈寿记载存在曲笔,这就使得笔者对史家笔下荀彧形象的真实性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陈寿《三国志》的回护之法曾受到钱大昕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评道:“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寿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矣。”<sup>[8]403</sup>指出西晋承曹操正统,陈寿作为晋臣不得不这样做,因此对于荀彧的书写即为其曲笔的表现之一。《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六《荀彧郭嘉二传附会处》:“《荀彧传》谓彧料袁绍诸臣,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法,配不纵也,不纵攸必为变。后审配果以攸家不法录其妻子,攸怒,遂背绍降操。又《郭嘉传》,操与绍相持于官渡,或传孙策将袭许,嘉曰:‘策勇而无备,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策果为许贡客所杀。此二事彧、嘉之逆料可谓神矣,然岂能知攸之必犯,配之必激变,策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毋乃亦如左

传之穿凿附会乎。”<sup>[7]131</sup>赵翼指出《三国志》对荀彧的书写存在附会之处。郭硕从史料记载背后的史家观念及其背景来探讨史家笔下的荀彧,认为陈寿《三国志》对荀彧“魏臣”定位以及荀彧之死的隐晦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魏晋禅代之际的政治环境。郭硕指出陈寿对荀彧的书写受到西晋朝廷对荀彧评判和荀彧后代力量的影响,而西晋朝廷评判荀彧一方面是因司马氏家族与荀氏家族关系密切,一方面是因荀彧反对操加九锡的行为不利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统治,也符合司马氏要为其政权寻找合法性的需要<sup>[9]61-67</sup>。笔者赞同郭硕分析的角度,但对其所述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看法。《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载:“华表令兼中书郎,而寿魏志有失勛意,勛不欲其处内,表为长广太守。”<sup>[10]634</sup>这表明陈寿所写不合勛意,笔者推测可能是陈寿对荀彧魏臣的定位而使荀勖不满。《三国志·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曰:“文帝受禅,朝臣三公已下并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徒,而不进爵。”<sup>[5]403</sup>西晋人华峤描述华歆在曹丕受禅登基之时因面露不悦之色而只为司徒未被晋爵。对此《世说新语笺疏·方正第五》载:“嘉锡按:华歆为曹操勒兵入宫收服后,坏户发壁牵后出,躬行弑逆。是亦魏之贾充,何至以形色忤时!歆、群累表劝进,安得复有戚容?雍客以为出于其子孙所附会,当矣。”<sup>[11]310</sup>指出华歆此种表现完全出于其子孙的附会之词,由此透露出西晋人有意把在魏为臣的先祖描述成汉臣形象,从这也可旁证荀勖对陈寿的不满。那么华峤为何要这样写呢?《晋书·宣帝纪》载:“魏武帝为司空,闻而避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sup>[12]2</sup>《晋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司马懿不愿屈就曹操的记载说明司马懿不愿承认自己做过魏臣的经历,表明当时人否认曹魏正统。东晋人习凿齿所写《汉晋春秋》即以蜀汉为正统。《晋书·习凿齿传》载:“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临终上疏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sup>[12]2154</sup>东晋人习凿齿认为西晋是承袭东汉正统而来。综上可知,两晋是一个否认曹魏正统以及有意塑造先祖为汉臣形象的时期,陈寿《三国志》中的荀彧形象存在塑造的嫌疑。

范曄《后汉书》除对荀彧的评价和对荀彧之死的记载与陈寿《三国志》不同外,其对荀彧与中常侍唐衡结亲的记载极力为荀氏辩白,以及荀彧的除亢

父令也要写在董卓之乱之前,以此更加突出荀彧的忠汉形象。郭硕认为,范曄在《后汉书》中对荀彧忠汉形象的描写并高度评价其死亡的意义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思想潮流有关,荀彧延续汉室江山和刘裕延续晋室江山的功业类似,着重强调其殉汉意义与当时的胡汉政权对立有关,与此背景对应的史家态度是对汉魏禅代的理解<sup>[9]</sup>,此时荀彧的忠汉形象已被完全美化。

## 二、荀彧忠汉形象的否定

对《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书中的荀彧忠汉形象,不断有学者提出异议。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六“荀彧传”条云:“论者或谓末路虽以失操意而死,而当其初去袁绍就操时,值吕布攻兖州,彧为操坚守鄄城及范、东阿以待操,谓昔汉高先定关中,光武先取河内以为基,此三城即操之关中、河内也。后又劝操迎天子,谓晋文纳襄王而定霸,汉高发义帝丧而得诸侯。是早以帝王创业之事劝操,何得谓之尽忠于汉?”<sup>[7]</sup><sup>130</sup>指出清代有人对荀彧的忠汉提出批评,认为荀彧早期就以深根固本的建议为曹称帝作筹谋,谈不上忠汉。学者李慈铭对荀彧忠汉一事也发表过评论,其《越缙堂读书记》评曰:“至于荀爽荀彧,实非贞士,而慈明之论,既表其图董之智;文若之论,又表其为汉之忠,此之立言,尤为过当。”<sup>[13]</sup><sup>187</sup>李慈铭认为前人对荀彧忠汉的定论有失偏颇,直指其“实非贞士”。这些质疑有无道理,可从与荀彧关系密切的大臣在汉魏禅代之际的表现窥见端倪。

荀彧在曹操集团官居尚书令,具有举荐人才的资格。《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曰:“……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sup>[5]</sup><sup>318</sup>由此知曹操集团中的很多人皆为荀彧所推举,而其所举荐的人才多为曹魏政权服务,代表者如华歆之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瞞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sup>[5]</sup><sup>44</sup>可见荀彧举荐的华歆和郗虑都是杀伏后的主要人手。又《三国志·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曰:“文帝受禅,朝臣三公已下并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徒,而不进爵。魏文帝久不怪,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百辟群

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也?’群起离席长跪曰:‘臣与相国曾臣汉朝,心虽悦喜,义形其色,亦惧陛下实应且憎。’”<sup>[5]</sup><sup>403</sup>华歆在汉魏之际为曹操称魏公积极扫除障碍——杀伏后,却在曹丕称帝时表现出哀容,而且陈群解释是因二人过去同为汉臣的缘故。华歆此番前后不一的表现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诟病。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杨彪陈群》载:“夫曹氏篡汉,忠臣义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纵力不能讨,忍复仕其朝为公卿乎?歆、群为一世之贤,所立不过如是。”<sup>[14]</sup><sup>127</sup>洪迈指出真正的忠臣义士在魏代汉之际应尽力征讨,至少不做曹魏的官员,而陈群和华歆在曹魏政权建立后就被授予高官,他们并无资格被称为东汉的忠臣义士。《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第一》:“李慈铭云:案华守豫章,兵至记迎;王守会稽,犹知拒战。华党曹氏,发壁牵后;王被曹征,积年乃至。”<sup>[11]</sup><sup>15</sup>李慈铭对华歆以豫章郡投降和杀伏后二事表示不满,其《越缙堂读书记》中的批判色彩更浓:“以华歆之牵后坏壁,郗虑之奏收孔融,为死党于操,皆名德自居,而泉獍其行。以钟繇陈群之议复肉刑,为助杀人。以辛毗之为袁谭使曹操,而陈说二康之必亡,为卖主以图己进身之基。以东京为亡于贾谢。以司马温公称荀彧为仁,其谬同于花史。”<sup>[13]</sup><sup>193-194</sup>李慈铭认为荀彧所举荐者在汉魏之际的表现都显示在为曹操服务,他们毫无忠汉的表现,司马懿对荀彧“仁”的称赞简直荒谬。

由上可知,与荀彧关系密切的人在汉魏之际并无任何忠汉的行为表露,他们在曹魏建立之后的仕宦历程也表明,这些人均尽力于魏,得到重用。《三国志·孙叔然传》:“陈寿评曰:钟繇开达理干,华歆清纯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sup>[5]</sup><sup>422</sup>即指出钟繇、华歆等人在曹魏建立之初就位列三司,且曹魏时期以功臣配飨太庙时陈群、华歆、钟繇等人皆在其列,可见他们为曹魏政权尽心竭力,何谈忠汉。从与荀彧关系密切的人在魏代汉之际的行为及其之后的经历来看,他们并无忠汉之心,这也可旁证荀彧并非忠汉,史书塑造的荀彧忠汉的形象并不可靠。如此一来,荀彧因忠汉而死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

## 三、荀彧死因臆测

倘若荀彧并非忠汉,那么他因忠汉而死的论断就不成立,由此笔者试图从荀彧推荐的人士入手来探讨其死因。

《三国志·郭嘉传》:“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

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祭酒。”<sup>[5]431</sup> 戏志才去世后，曹操让荀彧在汝、颍奇士中推荐可继之人，表明荀彧是曹操阵营人才流入的重要通道。那么荀彧向曹操举荐了些什么人呢？《后汉书》卷七十《荀彧传》：“及帝都许，以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彧筹焉。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皆称其举。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并负败焉。”<sup>[6]2284-2285</sup> 可知荀彧为曹操推荐的多为颍川人士。《三国志·荀彧传》记载更详，其注引《彧别传》曰：“……彧从容与太祖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太祖常嘉纳之。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隽咸宗焉。司马宣王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侔，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钟繇以为颜子既没，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sup>[5]318</sup> 据此可知被荀彧推荐的以颍川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后来大都功成名就。洪迈和王夫之曾论及荀彧及其所举者在曹操身边的作用。《容斋随笔》卷十二“曹操用人”条：“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sup>[4]157</sup> 《读通鉴论》卷十“三国”条：“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而兴。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sup>[15]270</sup> 今人对此也多有研究<sup>[16]</sup>，柳春新指出：“颍川士人在曹魏政权的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sup>[17]</sup> 可见颍川士人集团在曹魏政权中举足轻重。颍川士人在曹魏政权中地位如此重要，而他们又多为荀彧推荐，那么荀彧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如何？

钟繇以为：“颜子既没，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sup>[5]318</sup> 司马懿言道：“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sup>[5]318</sup> 可见颍川士人对荀彧心悦诚服。关于汝颍士人孰优孰劣，陈群与孔融曾有过一场争论。《三国志·荀彧传》注引《荀氏家传》载：“陈群答：‘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sup>[5]316</sup> 从党锢之祸后的陈寔开始，陈群家族不断发展，有“陈

氏三龙”的美誉，陈群不举自己家族而举荀氏家族的例子，表明荀氏家族在颍川士人心中占有重要地位。陈群所举荀家之人在曹魏政权中的确举足轻重，荀彧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居中持重，建安八年封万岁亭侯，荀攸居谋主之位，荀衍为监军校尉，荀悦为秘书侍中，而荀彧正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胡宝国曾指出，东汉末年颍川名士的结交风气很盛<sup>[18]127-139</sup>，这一风气或多或少会对荀彧产生影响。荀彧向曹操所举之人多为颍川人士，这就使得荀彧有结交朋党的嫌疑。荀彧既有结交朋党的嫌疑又是势力庞大的颍川士人集团的领袖，很容易引起曹操的猜忌。曹操在荀彧死后才称魏公一事也可印证这一点。赵翼曾对此评论道：“寿志虽列之于魏臣，而传末云，彧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锡，可见彧不死操尚不得僭窃也，则蔚宗之编入汉臣，自是公论也。”<sup>[7]120</sup> 可见荀彧对曹操存在威胁。综上所述，荀彧是因其背后庞大的政治势力和结交朋党的嫌疑引起曹操猜忌而死的。

与此相类似，孔融和崔琰的死也可印证荀彧之死。先看孔融被诛。《后汉书·孔融传》载：“岁余，复拜太中大夫。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sup>[6]2277-2278</sup> 孔融经常推举贤明之士，为海内名士所信服，这与荀彧类似。孔融退闲在家期间，很多宾客上门探视，这也成为曹操诛杀孔融的罪名之一。再看崔琰之死。《三国志·毛玠传》：“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sup>[5]375</sup> 《三国志·和洽传》：“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幹事，其选用先尚俭节。”<sup>[5]655</sup> 这两则材料都表明崔琰和毛玠掌选举，且其所选之人皆为清正之人。又《三国志·崔琰传》：“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琰尝荐钜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后太祖为魏王，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

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sup>[5]</sup><sup>369</sup>由此可知,崔琰、孔融与荀彧一样,皆是有威望之人且负责为曹操选送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崔琰开始只是因言语不当被贬为徒隶,但被罚期间仍有许多宾客前去拜访,最终被曹操赐死。

综上所述,孔融和崔琰皆为名望之士且也多推荐人才,他们还在赋闲和被罚期间明目张胆地与宾客往来最终被曹操所杀,可见曹操很忌惮名士领袖结交朋党。荀彧所举荐者多为颍川士人,使其更有结交朋党的嫌疑,同时荀彧又是势力庞大的颍川士人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更容易引起曹操的猜忌而惹上杀身之祸。因此,笔者认为荀彧向曹操举荐大批颍川士人,声望日隆,终为曹操所忌,不得已而死。

#### 注释:

- ①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孟聚:《荀彧其人》,《许昌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何兹全:《读〈三国志〉札记:荀彧之死》,《文史知识》2003年第9期;张剑英:《荀彧和荀彧父子政治取向浅论》,《许昌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乔凤岐:《荀彧“失语”与赤壁之败及曹操用人之变》,《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逯耀东:《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台大历史学报》1997年21期。
- ②《献帝春秋》也称《汉献帝春秋》,其作者史料所引有所不同。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献帝春秋》作者为袁晔,又为袁晔;《后汉书注》《太平御览》皆为袁晔;《隋书·经籍志》录《献帝春秋》作者有袁晔和袁晔两人;《文选60卷》(胡刻本,938页)丘迟《与陈伯之书》所引《汉献帝春秋》作者为袁宏,对此《文选旁证46卷》(清道光刻本,566页)何校宏改晔;沈家本、钱大昕、王祖彝录《献帝春秋》作者为袁晔,而赵翼所录同《隋志》有袁晔和袁晔两人。可见,其作者尚无定论,学界亦有所研究。沈家本、王钟翰、陈垣已考证《献帝春秋》作者为袁晔。高敏《〈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指出钱氏认为作者是袁晔,沈氏认为袁晔、袁寔系一人异名但无史料支撑,对沈氏等所言予以反驳,其依据为裴注言明袁晔撰《献帝春秋》之前已引袁寔多条,认为袁晔、袁寔二人似非一人,故其持存疑态度(《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5-21页)。王丽《沈家本〈三国志〉所引书目研究》也持存疑态度(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高振铎《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正〉》认为《献帝春秋》作者应为袁晔,其依据是1377页裴注明言:“(袁)迪孙晔,字思光,作《献帝春秋》,并指出裴注另两处‘晔’‘晔’

是形近致误以及《礼记》中误‘晔’为‘晔’”(《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41-46+80页)。因大多史料所引作者和学界观点认为其作者皆为袁晔,笔者也赞同该观点,但对其是吴人袁迪孙持存疑态度,因《隋书·经籍志》沈家本、钱大昕、王祖彝、赵翼所录《献帝春秋》作者不论是袁晔或袁晔,皆认为其成书于晋。

#### 参考文献:

- [1]杨少卫.荀彧及其悲剧[J].怀化师专学报,1995(1):18-23;文明元.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J].云南学术探索,1995(2):53-57.
- [2]孟祥才.论荀彧[J].史学月刊,2001(1):47-52;李磊.荀彧之死——一个关于汉末士大夫“匡复之志”的隐喻[J].贵州文史丛刊,2009(2):11-15.
- [3]郭硕.荀彧之死与汉魏之际的政局[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3):21-25.
- [4]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6:28.
- [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
- [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403.
- [9]郭硕.“汉臣”抑或“魏臣”:史家笔下荀彧身份的流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61-67.
- [10]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34.
- [1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由云龙,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4]洪迈.容斋随笔[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5]王夫之.读通鉴论[M].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5:270.
- [16]孟繁治.颍川谋士群体与曹操政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69-74;王大胜.汉晋时期的颍川士人集团[J].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25-29;李俊恒.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的形成及其政治际遇[J].许昌学院学报,2007(6):21-25.
- [17]柳春新.曹操政权中的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1:26-35.
- [18]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J].历史研究,1991(5):127-139.

[责任编辑 文川]